

政治学研究

# 国家、工人与认同斗争:回溯至马克思

陈周旺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观之,身份认同的丧失乃是工人在现时代面临的最严峻处境,马克思的解决方式就是赋予工人“阶级”身份。现代国家的兴起,导致了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认同斗争主要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与葛兰西将意识形态视为工人认同斗争的惟一胜算。随着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西方世界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认同斗争具有了不同的逻辑,后者的产业工人惟有依托民族国家对抗全球资本。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吁求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而不是对立,产业工人亟待将其阶级身份与公民身份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工人 国家 认同 异化 意识形态

## 一、身份异化

应该说,是马克思第一次将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之中,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将认同问题确立为工人政治的起点。马克思将工人的生活状况喻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奴隶,甚至认为工人的地位连奴隶都不如。这也许可以通过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管窥一二。奴隶在强迫劳动中,通过“对象化”自然,至少还形成了自我意识;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工资的活动,却使工人越来越走向毁灭: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失去生活资料,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sup>①</sup>一言以蔽之,产业工人这个群体,是彻头彻尾的一无所有,因为她连自我意识、身份认同都彻底丧失了。即是说,身份认同是最后的“所有物”、工人最后的防线;有关身份认同的斗争,也必是社会斗争中最为尖锐的斗争。

马克思用了一个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来描

述工人自我意识的这种沉沦:异化。这里所谈论的“异化”,当然不应被泛泛而谈,成为一个随意的标签。马克思的阐释者之一伊林·费彻尔给“异化”下了一个定义:“当个人所创造的对象遵从自身的规律性而冷眼漠视个人的愿望与希冀,并最终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与个人对立时,对象化就变成了一种‘异化’。”<sup>②</sup>费彻尔的定义代表了很多人对“异化”的理解,值得认真对待,但仍然是过于简单化。就费彻尔如此理解的“异化”,倒不如用“错位”、“颠倒”、“角色互换”、“变质”这些词更为合适,却何必一定要用“异化”?“异化”中又何来“劳动异化”,与工人政治又有何关系?

我们通常根据英文 alienation 把“异化”理解为“外化”或者“疏远”,但是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这一集中讨论“异化”的文献中,“外化”、“疏远”、“物化”都有专门的术语来表达。<sup>③</sup>可见,“异化”的精确涵义绝非如此简单。有研究者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比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异化更为准确,也更能

【作者简介】 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①③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52页。

② 艾林·费彻尔著,鲁克俭、赵玉兰译《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说明问题。<sup>①</sup>此言非虚。在1932年手稿发现之前,卢卡奇就用“物化”来阐释“异化”,也正是他,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指出“异化”其实指的是“售卖活动”,<sup>②</sup>是一个带有哲学阴影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劳动异化”是指工人出卖劳动力,并且被他所出售的东西所支配;从哲学含义上,是一种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被售卖出去,而人因此沦落到被支配的状态。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卖淫为例,恰当地指出了“异化”的涵义。用“异化”这个术语,就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工人出卖劳动力这一活动的哲学意义。照此看来,马克思的“异化”本来就不是什么深奥的概念,其实就是指“售卖”。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售卖,或者说这种“异化”将达到最高阶段,于是便有了《共产党宣言》中这个著名的段落: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sup>③</sup>

应该注意的是,“类”、“异化”这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那里已经很少出现,马克思与恩格斯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异化”这个术语嘲弄了一番。原因很简单:这些概念都找到了它们“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替代品,使之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的“异化”跟后来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是通过“异化”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丧失。“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sup>④</sup>换言之,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人不可能通过异化了的、也就是被售卖的“雇佣劳

动”来获得自我意识。一经出售,工人与劳动之间就如同永诀的恋人,永远山水相隔,无法相互对象化,也就失去了自我意识生长的可能。工人自我意识的丧失,意味着工人在现代世界中并无希望找到自身的身份认同,他只有“扬弃”,即“超越”之意,也就是从现代世界高墙的阻隔中一跃而出,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工人也就由此构成了对现代世界最根本的批判性力量。

也就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工人解放的意义在于人的解放。“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sup>⑤</sup>这句话的涵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过系统的阐发。在该文中,马克思将哲学的革命类推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指出哲学只有消灭自身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无产阶级不正是只有消灭自己,才能消灭阶级社会吗?“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sup>⑥</sup>更为尖锐的是,马克思将工人的解放路径集中在了身份认同的斗争上。因此,赋予工作的人(working man)一个“阶级”的身份,便成为马克思终身的事业。

## 二、意识形态:惟一胜算

现代世界的兴起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身份政治,现代人在社会中只有“角色”而无“身份”,他们从中世纪传承下来并加以成功转换的惟一世俗身份就是“国民身份”。国民身份是现代国家兴起的必然后果。基于此,工人的认同斗争就集中在与现代国家之间的拉锯上。

现代国家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政治的性质。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是“国家”一词的始作俑者,在他笔下,“政治家”不再是道德楷模,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个人道德的人。政治家应以群体的名义合法地采取行动,与对手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此之谓“国家理由”。相应地,政治的内涵从柏拉图意义上的和谐、正义转变为为了利益的斗争。

① R. 伯尔基著,伍庆、王文扬译《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6~167页。

② 乔治·卢卡奇著,王玖兴译《青年黑格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2页。

③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213页。

④⑤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单行本),第52、62~63页。

从普鲁士时代起,马克思就对这个建基于阶级利益斗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政权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当时的普鲁士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马克思用“林木偶像”来隐喻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征,其意指现代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共同体形式”,<sup>①</sup>否定了传统的习惯法体系,致使其统治之正当性不得不依赖于一种新的共同身份的刻意塑造。故马克思轻蔑地称现代国家为“虚幻的共同体”。

对于无产阶级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对立,最著名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没有祖国”一说,该说足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基础。姑且不论“工人没有祖国”中将 nation 译为中文的“祖国”是否恰当,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用意在于将工人与现代国家置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在理论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到国家的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集中强制手段乃是国家权力之优势所在,尽管暴力的垄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明风化过程;<sup>②</sup>二是国家权力是被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绑架的,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诚如迈克尔·曼所言,国家除了“领土性”之外并无独立的权力来源,<sup>③</sup>这正是国家权力自主性与工具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前提。既然工人被赋予“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就必定与现代性的“守夜人”国家势不两立。工人与现代国家的惟一联系,就是去打碎它。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工人没有祖国”。

不过,众所周知,马克思初期并不把国家作为一个自主权力来对待,而视之为与资产阶级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组织。事实上,要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才意识到现代国家作为一台相对独立的暴力机器直接与工人对立的可能性。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工人与国家在认同层面上的争夺。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无产者阶级意识最大的对手,就是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诚如

蒂利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纯粹缘起于暴力的集中,<sup>④</sup>这样一台暴力的“容器”若要获得资源和精神上的支持,就要争取到其权能范围内所管辖人口的效忠,除了承诺各种权利,更重要的是灌输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让其臣民形成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想象”。<sup>⑤</sup>对于工人的认同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人的民族主义将消解工人的阶级意识;反之,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马、恩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后便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呼应,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是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打破民族主义的藩篱,产生出一致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对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一语成谶:西欧各国工人不久都参加了本国军队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不同民族国家的工人相互为敌,致使西欧的国际工运遭遇重大挫折。这正是民族主义消解阶级意识的惨痛历史教训。

如此一来,所有的斗争都将聚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民族认同正是现代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而塑造出来的,诚如迈克尔·曼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形态那样理解“垄断规范乃是通向权力之路。”<sup>⑥</sup>显然,工人与统治精英的斗争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领域,同时还更尖锐地发生在精神领域。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相比在市场领域,国家发挥更加积极也更直接的作用。因为,一种统一的、在社会精神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都是借助国家权力塑造和实施的。在前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更多与神圣力量结合在一起,凌驾于世俗政治组织之上。现代化使政治权力面临“祛魅”进程,权力的神秘主义色彩消失,遂使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成疑,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传统权威体系崩溃便是此理。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对于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反而比之前任何一种政治单位都更严重,而意识形态自身也不断趋于世俗化,成为社会力量争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① 陈周旺《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II),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③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25(1985).

④ 查尔斯·蒂利著,魏洪译《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 本·安德森著,吴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⑥ 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30页。

马克思之所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马克思也许认为意识形态是工人斗争的惟一胜算。诚然,马克思主义比任何理论流派都更强调意识形态的依附性特征,直指“任何一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sup>①</sup>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sup>②</sup>换言之,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比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它在理论上更优越。从斗争策略上,工人无论在资源、技术、组织化程度等哪一个方面都比统治阶级要处于劣势,除了意识形态,这已经成为工人的惟一胜算。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斗争,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作为工人斗争最重要、也是最后的策略。

马克思的“惟一胜算”理论,被葛兰西全盘继承。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通过强制性的生产体系,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层建筑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支配工人,使工人“束手就擒”。葛兰西深谙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酷性,因为统治阶级知道这是他们的惟一软肋,必然会有意识地强化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渗透能力,确立其市民社会霸权;工人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他们总是在自己最不擅长、甚至必败无疑的地方下手来展开斗争,包括捣毁机器、占领工厂,这些斗争除了泄愤,很难有所改善,也无法争取到普遍的同情。比如工人破坏生产、罢工,给其他市民造成不便,反而将自己置于不仁不义之地。马克思将这些未及认同斗争层次的行动,统统称作“自为”的反抗。“自觉”的工人应是懂得运用意识形态工具的。当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者争夺霸权,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游击战转到阵地战,并最终占领制高点。无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什么程度,最终一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sup>③</sup>这就是认同斗争的全部意义所在。

### 三、全球化:新拉锯战

马克思的时代,即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

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的对立使阶级作为一个抗争符号而发挥作用。通过唤起工人的自我意识,工人对资本主义旧体制及其保护者国家机器发起一场革命是可欲的。这就是马克思运用“阶级”一词,让工人从“自为”走向“自觉”的意图所在。西方社会早期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后西方社会的新发展,在如下方面改变了工人认同斗争的命运:

第一个趋势是资产阶级的分化。马克思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发现了资产阶级分化的可能,即分化为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sup>④</sup>马克思认为,金融资产阶级是与保守的国家机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专制力量,将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工业资产阶级则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同时带动工人阶级的成长,彼时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力量。问题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产阶级的崛起扼杀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中心国家仰仗金融资本的控制,制造业则向全球转移。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工人自我意识进一步瓦解,致使众多西方学者产生“工人阶级消逝”的假象。<sup>⑤</sup>

第二个趋势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是办公室白领阶层。无论是资产阶级分化还是中产阶级的形成,都使阶级对立的简单化进程重新走向了复杂化,也形成了多元化的认同之争。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收入模式、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以之区别于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在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消费模式通过大众传媒广为传播,成为效仿之对象,正在与上层资产阶级、底层的工业劳动者竞争认同,使认同斗争进一步复杂化。

第三是国家的吸纳。在西方世界漫长的劳资冲突中,国家政权并未袖手旁观,而是一直发挥着恩格斯所说的“调节者”作用。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实际上强化了国家的强制权力,使之有更多的能力干预社会冲突。国家通过劳动关系立法、社会福利政策、劳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100页。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Avner Cohen, “Divided Capitalism and Marx’s Concept of Politics,” XLIII (1995)。

⑤ 陈周旺《工人政治再释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资协商制度建构等进一步强化其处理劳资冲突的制度化能力。同时,包括普选权在内的政治公民权的扩大,使工人不断被吸纳到政治体制中去,进而消解了其阶级意识。<sup>①</sup>时至今日,工人抗争的声音虽未消除,甚至此伏彼起,但工人更多是诉诸于一种职业群体的身份,而非其阶级身份。

在西方世界,工人的认同斗争已经面临全面危机。经过长期发展,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生产和运作已弥散在日常生活各个角落,而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国家体制化的权力形式。<sup>②</sup>对于工人而言,意识形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不仅发生在政治场域,而是直接发生在工作场所、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这与资本权力的“泛化”是同一个过程。迈克尔·布洛维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霸权理论充分运用到他对生产政治的人类学考察中,指出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人身控制为主的专制方式;第二种是以建立认同为主的霸权方式,让工人心甘情愿接受资本的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控制也逐渐从早期的专制向霸权转移,通过设计“赶工游戏”和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丧失了抗争意识,而甘愿接受资本的安排。可以说,布洛维对工人抗争的前景基本上抱悲观主义,按照他的考察,工人在意识形态这个惟一握有胜算的斗争领域也都缴械了。<sup>③</sup>

尽管存在诸如布洛维那样的悲观主义,但工人的认同斗争不仅没有结束,也许将持续下去,甚至随全球的工业化浪潮而扩散,形成新一波“工人的力量”。<sup>④</sup>二战前后,随着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浪潮,新兴民族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使认同斗争已经超出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狭隘范围,而被赋予崭新的意涵。

在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人认同斗争遵循的是不同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扩张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特征,这将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

战争。对于第三世界工业化国家而言,具体表现为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第三世界工业资本的压迫和剥削。这是金融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分裂在世界范围内的再现,表现为全球资本对一国民族工业的整体性压迫和剥削。

这样一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面对全球资本咄咄逼人的威势,其阶级身份和民族身份获得了一致的基础,那就是对全球资本的抗争。此时,认同斗争就发生了根本转向:不再是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对立,而是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经验上,在全球资本的支配下,大多数新兴民族国家迄今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生产体系,而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所谓“普遍同质”的意识形态。在此情势下,这些国家内部工人认同斗争的最有力工具,就是所在国家的民族主义。

概言之,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高度结合,工人的阶级身份不断被消解、吸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工人面对的是全球资本的压迫,工人惟有依托民族国家相对抗。民族主义遂成为产业工人硕果仅存的、能够令全球资本生畏的力量。马克思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本身虽意涵对现代国家意识的强烈批判,事实上却只有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语境下才成为现实,因为只有在这里,工人才真正开始面对全球资本的奴役,而他们的“惟一胜算”也就在于“通过”民族国家来联合。

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统一,意味着工人的认同斗争将经历从早期单一的阶级认同向一国的公民身份的转变。用查尔斯·蒂利的话来说,工人将形成两种认同:超然性认同与嵌入性认同。<sup>⑤</sup>前者是公民身份,后者是阶级身份,两者应有机统一在产业工人身上,这是工人重建其身份认同的双向过程。一方面,工人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通过实现自身经济社会权利和政治参与,来塑造一种基于公民权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国家的角色也应有所调整,除了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系来吸纳工人的政

① 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约翰·汤普森著,高铨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③ 迈克尔·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④ 西尔弗著,张璐译《劳工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⑤ 查尔斯·蒂利著,陈周旺等译《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治参与,更应该在全球化条件下重建基于本土文化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以对抗全球资本单一化的话语霸权。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工人的认同斗争从此也更趋复杂化、艰巨化。

### **State , Worker , and Identity Struggle: Look back on Marx**

CHEN Zhou-w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Karl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 the most serious situation for the workers in modern times is the loss of identity. Marx's solution was to give them a class identity. The rise of modern states led to the intens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s identity. Marx and Gramsci considered ideology as the workers' only chance of winning in the identity struggle.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 the logic of identity struggle became different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rest. The emergi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ppeal to unify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lass identity , which require the workers to combine the class identity with their citizenship.

**Key words:** worker; state; identity; alienation; ideology

[责任编辑 刘 慧]